



巴尔扎克集 05 柳鸣九 编选

农民

〔法国〕巴尔扎克 著 陈占元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巴尔扎克集 柳鸣九 编选

农民

〔法国〕巴尔扎克 著 陈占元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 / (法) 巴尔扎克著; 陈占元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7
ISBN 978-7-5426-5184-6

I. ①农… II. ①巴…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0567 号

农 民

著 者 / [法国] 巴尔扎克

译 者 / 陈占元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梁清波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26 千字

印 张 / 21.75

ISBN 978-7-5426-5184-6/I · 1031

定 价: 36.0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璞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间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译本序

1

《农民》同《乡间医生》和《乡村教士》一样，都是属于《人间喜剧》里面《乡间生活事迹》一组的小说。巴尔扎克在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给伊波利特·贾斯提的信里，曾提到这部小说，把它称为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执笔，但由于重视搜集具体情况，因而完成得比较晚的作品之一。《农民》第一部在一八四四年年底才开始在《新闻报》连载，作者在《献词》的最后一段说：“这部小说是我下了决心要写出来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八年以来，我多少次辍笔，又有多少次再执笔写这部书……”在一八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农民》是在八年前开始写的，卖出去许多次，又收回来了。是一项繁重的、费力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可是毫无疑问，它将使计划这个作品的工程师受到称道。”可见巴尔扎克对于这部小说的重视。他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这部作品；这一回，又是为了经济问题，才把《农民》写出来。他只写好了《献词》和第一部的十三章、第二部的前四章，此外只留下一些草稿；作者死后，他的妻子根据草稿续成第二部的第五至十章（约合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全书在一八五五年出版。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虽非完全出自巴尔扎克的手笔，但仍然不失为《人间喜剧》里重要的作品之一。写这部书的时候，作者的艺术功力已经成熟，对于《人间喜剧》的整个内容和意义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因此就内容深刻、结构谨严、刻画细致、风格明朗而论，《农民》都是属于《人间喜剧》全部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巴尔扎克是一个独具只眼的社会观察家，马克思称道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①，他可以当之无愧。巴尔扎克生于一七九九年，死于一八五〇年，经历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法国社会。这五十年间，由于“现代工业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整个法国社会起着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逐渐巩固它的统治，并且加深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当时由于政治、经济急剧变化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和人情风俗，都引起巴尔扎克热烈的兴趣，他对这些现象作了广泛和深入的观察，在《人间喜剧》里面把这些现象用鲜明、细致、深刻和繁复的图画反映出来。

法国小说到巴尔扎克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以前，还没有人那样全面、那样深刻和用那样辉煌的艺术来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个天才作家在写出《人间喜剧》第一部小说之前，曾经走过一段艰苦、曲折、漫长的道路；他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学习写作、观察社会和体验生活；以切身的体会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钻研了当代生物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中新的学说；重视社会环境对于个人的影响；看到历史上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企图塑造出每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他从英国小说家华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得到启发，相信有可能将这些环境和人物分别表现在不同的小说里面，让这些人物在各部小说中互相穿插，从而把这些小说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他要写一部生动的当代风俗史的雄心。

他用真名实姓署名的第一部小说《朱安党人》，是一八二九年发表的，就在七月革命的前夕。七月革命把路易·菲利普送上法国的王座，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时代开始了。资产阶级是七月革命的胜利者，在路易·菲利普整个朝代，部长、议员、银行家、高利贷者、商人、律师、法官、出卖灵魂的文人、依附资产阶级的贵族和僧侣等，都营营逐逐、无孔不入、追名逐利，有的明目张胆，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 20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有的偷偷摸摸，并且把他们的风俗、习惯、生活作风、道德信念，作为这个社会的纲常。巴尔扎克看见了这些现象，他要把这一切分门别类描写出来。投机倒把、欺诈取财、巧取豪夺、荒淫无耻，构成了《人间喜剧》大部分小说的经纬，织出了这个喜剧中两千多个人物的穷通祸福，悲欢离合。金钱成为这个腐化的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唯一媒介，一切神圣、健康的东西都被它侵蚀了。在《人间喜剧》里面，从一八三〇年的《高利贷者》的片段起，作者通过德尔卫律师的口说：“我看见了金钱势力的化身。生活、人类，使我感到害怕。一切都要凭金钱解决嘛！”直到一八四七年的《贝姨》，书中那个卑鄙无耻的克勒卫说：“你以为统治国家的是国王路易·菲利普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倒没有妄自尊大。他跟我们一样知道，在大宪章之上，还有那人人敬重的、结实的、可爱的、妩媚的、俊俏的、高贵的、年轻的、万能的，五法郎的银币！”一年后，一八四八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整部《人间喜剧》可以说是这个天才论述的生动的说明。

巴尔扎克出身资产阶级，关心这个阶级的命运，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层都非常熟悉，而《人间喜剧》的中心内容正是这个社会的各种现象和人物；由于当日高踞这个社会的通衢大道的人是资产阶级，所以《人间喜剧》不愧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社会的一部相当全面的生动、翔实的文献。资产阶级发动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但这次革命有赖工农群众的力量才获得胜利，特别是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它由于有工人阶级参加才得到成功。力量不断增长，造成愈来愈大的压力，掀起新的问题，产生新的学说。在路易·菲利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的整个统治期间，工人暴动和起义此起彼伏，最后发生了一八四八年二月和六月的工人革命。在同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学说也风起云涌，最后在一八四八年产生了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巴尔扎克对这些年代里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种种社会学说曾密切予以注意，他对这些斗争和学说的认识构成他的现实主义广阔和深刻的基础；虽然巴尔扎克由于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在《人间喜剧》里面很少直接写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斗争，但是他对于当日法国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描写和对于这个社会堕落腐朽的无情暴露，以及他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和体力方面的优点和他们的穷困处境着墨不多但是比较真实的反映，都是和这种认识分不开的。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写道：“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他不止一次自称为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必须指出，他的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主张只是他认为可以挽救当时社会的一种手段。巴尔扎克一心要维护法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梦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权以防范造成社会混乱的人，这些人首先是当日掌握了政权的金融资产阶级。他看到当时不断增长的工农群众的力量，为了安抚这些力量，他认为需要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利用这些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为了防止人民掀起革命，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他要这个强有力的政权对这种力量加以镇压。他曾称道“聪明和进步的群众”，一再指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产物，他们的恶习在大多数情形下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他仍然把上述缺点看成仿佛是劳动人民固有的缺点，否认他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并提出了他反动的君主制度的主张。

巴尔扎克直接表示的政治主张，其根源存在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里面，但是这些主张也受到其他属于一时的人、事或社会原因的影响；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思想与《人间喜剧》里面所表现的思想截然分开。在政治上，巴尔扎克害怕革命，拥护资产阶级秩序，但在他的创作里面，作为一个虎豹登堂、豺狼当道社会的

非凡见证人和卓越的画家，他不是明白地指出——或至少也是使他的读者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秩序并不值得加以拥护，而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么？在《乡村医生》里面，贝尼西大夫是巴尔扎克的君主政体和天主教的主张的代言人，他却说：“有些人从来没有估计到人民的水深火热，却责难人民过分的报复行为！……”他接着说：“……有朝一日，政府给个人带来的不幸，更甚于它所造成的繁荣，只要一有变动，它就会被人民推翻；人民推翻政府，就是他们跟政府清算的方式。”这些富有爆炸性的话和它们激烈的语调，在《人间喜剧》里面并非是罕见的，但是他提出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这些话或者表示一种隐忧，或者表示一种警告。

巴尔扎克对劳动人民见解的矛盾以及他错误的政治主张使他的创作受到了限制。在一八四二年以后，他几乎没有写过足以与三十年代他全盛时期的创作媲美的作品，一八四六年的《贝姨》和一八四七年的《邦斯舅舅》是他创作生命的回光返照，这两部作品阴沉的调子代替了以前的作品中磅礴的气势。对于当时某些历史现象，巴尔扎克并非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无法理解它的积极意义，因此他的艺术也没有力量将它们表现出来。有些现象他也接触到了，例如他的三部后期的小说：《农民》《小资产者》和《阿昔的议员》，巴尔扎克企图在这些作品里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描写法国社会当时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他的创作似乎要朝着新的方向迈进一步，但是这三部作品都没有完成，这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的作品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历史内容，他所写的主要是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但是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他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代的法国历史，但是也隐约窥见这段历史的发展。法国文艺批评家拉法格讲到马克思把巴尔扎克看作他那时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把他看作一个先知的人物典型的创造者：“不错，巴尔扎克因为能够深入理解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本质，他所塑造的人物在我们的时代的资产阶级身上还有典型的意义。同时，《人间喜剧》固然很少写到工人阶级和

他们的斗争，但是依然十分清楚地揭露了当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不可抗逆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意义上，《农民》是《人间喜剧》里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部作品。”

2

《农民》是一部描写被压迫者反抗剥削者的故事。

巴尔扎克注意到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共和政府标卖贵族产业和教会产业，特别是在农村资产阶级出现以后，大片地产分割成为小块土地，小地主代替了大革命以前的封建大地主，而农村资产阶级又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对付贵族，分裂旧日的土地。巴尔扎克写《农民》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农民与占有土地的贵族大地主之间的斗争。同时，作为保皇主义者，他梦想恢复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封建地主制度，他要在《农民》里面支持他这个主张。在巴尔扎克的思想里，穷人反对富人，农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如果获得胜利，就是天翻地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他要在这个“使人触目惊心的实录”里面揭发这种事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站在保皇党立场的，他反对当时的社会学说和民主潮流，他要“把我们今日依然称为弱者的人如何长期阴谋推翻那些自以为强者的人，就是说，把农民如何反对财主，作一番研究……点醒将来的立法者”。在文学上，他要揭发像乔治·桑那些作家所写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将罪犯写成诗歌，对刽子手表示怜悯，把无产者几乎奉为神明”。《农民》和巴尔扎克其他结构复杂的作品不同，情节简单，作者用许多他观察到的正确的事实，从头至尾都是描写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让我们看见一幅当日法国农村生动、真实的图画。

在小说开端，作者通过书中一个人物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艾格庄，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这个庄院是法王亨利四世的一个情妇手建，后来属于路易十四王太子的宠妃，

十八世纪为路易十五的一个财政大臣购得，赠与巴黎歌剧院的一个女歌唱家，这个巴黎的“邪道”死后由十一个贫农继承这份产业，后来又由帝国时代一个将军购得，——这个庄院的历史概括了从十七世纪到一八三〇年法国的社会变迁。在巴尔扎克的乌托邦社会里面，社会组织像金字塔一样，底阔顶狭，分为若干阶层，最上层是贵族社会，文物教化有赖这些养尊处优的人物才能维持不坠。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里不厌其详，把艾格庄的园林山水、亭台楼阁介绍了一番之后，接着无限感慨地说：“有些冒牌哲学家，表面上关心人类，其实是关心自己，管这些美丽的东西叫作铺张浪费。他们对于棉织品和现代工业恶俗的新玩意儿赞不绝口，好像我们现在要比亨利四世、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时代更加伟大、更加幸福似的。我们将会留下什么宫殿、行宫、房屋、艺术品和金线织成的锦绣呢？”作者的思想，他在前面已经概括地说出来了：“我的天！他们怎么会不明白，没有巨富的人家，没有稳定的富豪生活，怎么能产生华贵的艺术品呢？”在这里，巴尔扎克回顾过去，留恋着一些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同样，巴尔扎克认为礼义廉耻，只有在丰衣足食的人那里才找得到，他说：“……有了宽裕生活才有道德，我们注意到，在最高的阶层里，当财产把室内陈设弄得金碧辉煌的时候，善恶之心就油然而生。”这种见解也显然是巴尔扎克由于迷恋过去而产生的一种乌托邦思想。巴尔扎克抱着攀龙附凤的思想，钦佩旧日的贵族，对于他们的没落不胜惋惜，因此他的作品，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①。事实上，巴尔扎克对于他的时代的贵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最尖刻的讥刺、最毒辣的嘲弄，却往往是针对这些人物而发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在《高老头》里面，年轻的拉斯蒂涅在雷斯多伯爵夫妇面前，无意提到那个倒霉的高老头的名字，那“正在拨火的伯爵好似烫了手一样，把钳子往火里一扔”，“伯爵夫人脸上白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集）第四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一阵、红一阵，明明是发僵了”。拉斯蒂涅这时感到十分尴尬，作者写道：“他好比走进一个收藏家的屋子，靠了有力的介绍才得进门，不料粗心大意地撞了一下摆满小雕像的古董橱，把三四个不曾十分粘牢的头撞翻了。”

这样的笔墨，在《农民》里面也可以找到，举一个很小但是很有力量的例子：勃龙德和勃洛塞神父陪着蒙戈奈夫人在艾格庄树林里面散步，听到贝奇娜姐儿（受蒙戈奈夫人照顾的一个女孩）的叫喊声，他们循声赶到，看见卡特莲·东沙欲帮助她的弟弟尼古拉凌辱贝奇娜姐儿。卡特莲告诉蒙戈奈夫人一行人说他们正在玩耍。勃洛塞神父这时高声说道：“你们真是禽兽！……应该把你们逮捕，送到重罪法庭去……”尼古拉应声说：“你们这一起人，你们在客厅里面搞的什么？（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瞧着伯爵夫人和勃龙德，他们两个打了一个寒噤）你们闹着玩，不是吗？”这样的文字，无异给整个贵族社会当头一棒！

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与贵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复辟时代，贵族和僧侣当权，所以显得突出。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已经日薄西山，再也无力与资产阶级抗衡了。贵族不只是道德败坏，他们在社会上也失去生存竞争的能力，让贵族来与资产阶级对抗，哪怕在复辟时代政权还掌握在贵族手里，胜负之数都是可以预料的。在《人间喜剧》里面，巴尔扎克不止一次反映了这种事实。我们再从《农民》里面举一个例子。蒙戈奈伯爵购得艾格庄之后，发觉管家高贝丹有欺诈行为，准备等到自己熟悉了艾格庄一切情形之后，便将高贝丹辞退。但有一天，他当场看见高贝丹作弊，忍不住气了，便发生了下面一场口角。

“‘你可是靠我的地养活的？’伯爵对他说，严厉中带着讽刺。

“‘您以为我能够靠青天过活么？’高贝丹笑着回答。

“‘滚出去，丑类！我把你撵走！’将军说，同时用马鞭打了他几下，因为当时没有旁人在场，那管家后来始终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

“‘您不给我离职证明书我就不走。’高贝丹离开了那个凶横的装

甲骑兵，冷静地说。

“‘瞧瞧警察局怎样说吧。’蒙戈奈说，耸耸肩膀。

“听到将军要把他送到警察局，高贝丹瞧着伯爵微微一笑。这个微笑有一种力量，使将军把胳膊垂了下来，仿佛他的神经给它切断了似的。”

这样细致的描写，在《人间喜剧》其他作品里面还有很多，在《农民》里面也有不少，但《农民》的特点，却在于它从头至尾都是描写一场激烈的、赤裸裸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这样就使这部作品在《人间喜剧》里面占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社会阶层的人物：一，贵族大地主蒙戈奈夫妇；二，以高贝丹、苏德利和里谷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三，以尼雪龙老爹、东沙一家和福尔松老头儿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的农民。阶级斗争是在贵族大地主与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展开的。

蒙戈奈原是巴黎关厢一个木工的儿子，法国大革命时代风云际会，在拿破仑麾下建立战功，晋封伯爵，拿破仑失败后，他和一个旧贵族小姐结婚，依附了波旁王朝。他的家产是在国外任驻屯军司令官时用不清不白的手段弄来的，他用造孽钱在布尔戈尼买了一片产业，叫作艾格庄。艾格庄附近几个乡的居民生活十分艰苦，过去在庄院的地里捡拾落地的麦子、在树林里采伐枯枝以补助家计。蒙戈奈借口农民违法捡拾麦穗，作践树林，雇用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护林队，又借助宪兵的力量，对农民加以压迫，激起农民的愤怒，群起反抗他们的剥削者。

巴尔扎克认为环境与个人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在《农民》里面十分细致地描写了贵族和农民的生活。一方面，贵族们的生活穷奢极侈，他们饭厅里的一面镜子，论价值，可以抵得穷人的全部家产；贵族一个人所占的土地，足够养活四百户农民；而农民呢，鹑衣百结，终年劳苦，不得一饱，男女老少，挤在一个阁楼里，睡在干草上面。农民无论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受到损害。但他们不是俯首帖耳甘受宰割的，农民对于剥削者的反抗，时隐时现，一直没有

中止过。在《农民》第一部第五章里面，以福尔松老头儿作为代表，作者忠实地反映了当时乡间的情况和农民的思想。福尔松老头儿这些话是在艾格庄上，当着蒙戈奈夫妇和他们的客人，还有他们的管家面前谈的，这一章的标题是“狭路相逢”。勃龙德对福尔松说，他穷到这个地步，只好怪他自己，因为他是自由的，只要他省吃俭用，就可以购买一块地，变成地主。福尔松老头儿答道：“我见过旧时代，我现在看见新时代，高贵的博学多才的先生，招牌换了，不错，可是酒没有改变！今天就是昨天的老弟。随您的便！刊登在您的报纸上面吧！我们解放了没有？我们永远属于同一个村子，大老官永远在那里，我管他叫作‘活儿’。锹是我们的传家宝，它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手。我们最大部分的收入都缴了税，给大老官也好，给收税官也好，永远要把我们生命化作汗水流掉……”他又说：“我们只好待在我们的乡镇里，由于环境所逼，好像绵羊一样被圈在栅栏里面，如同从前大老官把我们圈起来一样。我不管什么东西把我钉在那里。被贫乏的法则钉住也好，被大老官的法律钉住也好，反正是终生钉在地里。我们就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刨地、铲土、施肥，我们给你们干活，你们生下来就有钱，我们生下来就穷。大伙儿永远是这样，生时穷，到死还是穷……你们不肯放弃你们的权利，咱们永远是冤家，三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能够指望我们作你们的朋友！”

连蒙戈奈听了福尔松的话，也不得不承认“这番话真是一篇宣战书”！

福尔松老头儿把农民对艾格庄现在主人的不满情绪告诉了蒙戈奈，接着他说：“告诉您吧，这一定没有好结果！这会使人想出下策，向您报复！”他又说，“大人，穷人的怨气愈升愈高！它要升得比您最高的橡树还高，而绞架是拿橡木做的……”

农民之间的阶级感情，巴尔扎克看得十分清楚，例如在第一部第三章的末尾，作者说：“不论用恩惠，或以利益，都不能够破坏用人和人民之间的持久的联系。仆役来自民间，始终爱护人民。”而农